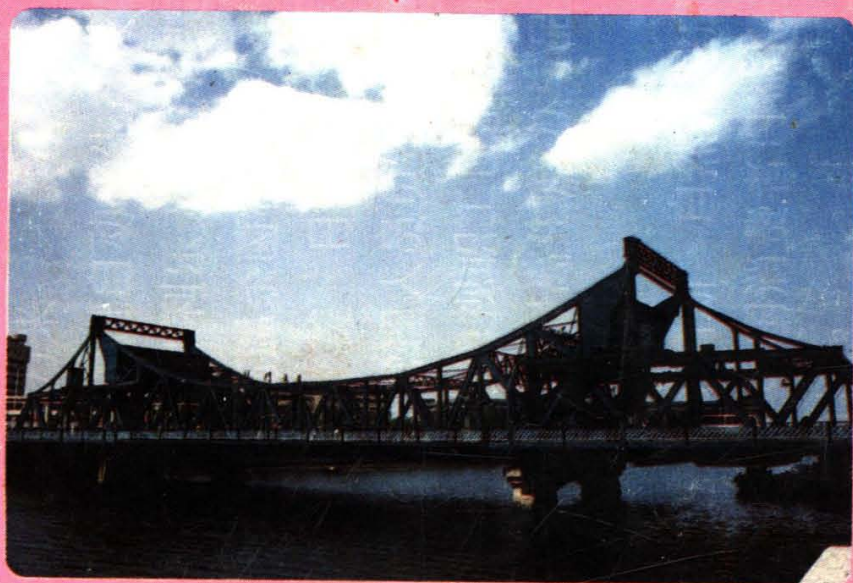


# 95. 1

(总第六十五辑)



要

● 一个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成长

● 宋哲元自纪

● 台籍抗日将领黄国书

● 金家当铺始末

目

● 内蒙古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回忆

#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 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**(津)新登字 001 号**

执行编辑:张笑平

版面编辑:康 明

校 对:张玉芳

张敦书(特邀)

**天津文史资料选辑**

1995·1(总第六十五辑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
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\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\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6.25 印张 156 千字

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7-201-02263-6/K·292

---

定价:4.50 元

# 目 录

《天津文史资料选辑》

1995·1(总第65辑)

## 抗 战 风 云

- 一个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成长 ..... 娄凝先(1)
- 台籍抗日将领黄国书 ..... 郑 平(17)
- 冀中抗日斗争片断 ..... 张 猛(25)
- 北上先锋部队首次挺进武清纪实 ..... 杨 平(36)
- 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..... 傅二虞(42)
- 中条山战役后的天津俘虏收容所 ..... 马友欣(45)
- 天津沦陷前最后一刻我撤出的经过 ..... 赵继曾(52)
- 被逼参加“勤劳奉仕”的回忆 ..... 张国贤(58)
- 卢沟桥事变后的天津抗战 ..... 常 凯(64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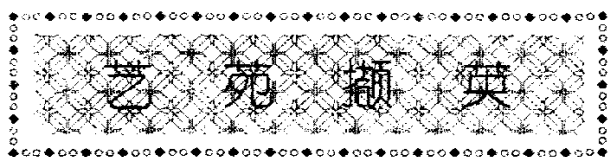
## 往 事 追 忆

- 内蒙古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回忆 ..... 陈 阜(69)
- 忆周恩来总理二三事 ..... 佘铁僂(79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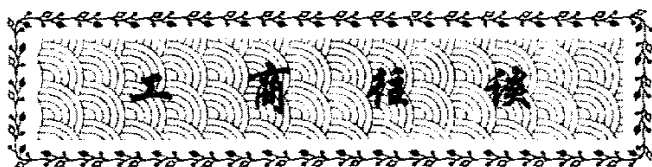
宋哲元自纪 .....	宋哲元(84)
宋哲元将军轶事 .....	李惠兰(94)



著名教育家魏元光事略 .....	王家琦(99)
王开治轶事 .....	王复礼(113)
杨十三与苇草造纸 .....	王家琦(119)



魏联升小传 .....	甄光俊(124)
孟广慧事略 .....	孟昭联(134)
津沽民族音乐家刘楚青 .....	陈嘉瑞(140)



忆上海银行天津分行 .....	朱继珊(155)
金家当铺始末 .....	金继光(168)

社 会 杂 相

天津水会的创立与解体

- ..... 杨桂山 李洁贤 于昭熙(176)  
老天津的杠房..... 于昭熙(184)  
天津济良所..... 金大扬(187)

史 海 珍 闻

天津中医医学教育家——陈泽东

- ..... 王士相 张玉泰(118)  
丁伯钰糖堆..... 王寿岩(16)

《天津文史资料选辑》61辑——65辑目录索引

- ..... (191)

- 
- 封面照片说明..... (98)
-

☆ 姜凝先 ☆

## 一个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成长

——回忆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创立

编者按：抗日战争时期，姜凝先同志是晋察冀边区政府的秘书长，又是山西“牺盟会”的特派员。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，他兢兢业业，艰辛工作，全心全意为边区人民服务，为创建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。解放后，很多在边区工作过的老同志见到他时，仍热情地称呼他为“秘书长”。他生前也多次提到：“在晋察冀边区政府工作，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事。”1984年他不幸病逝，至今已整整十年。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中，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张洪祥先生曾多次访问过他，了解到很多鲜为人知的史料，为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，并缅怀姜凝先同志。张洪祥教授将多次访问的记录，整理成此文。公诸于世，以飨读者。

---

抗日战争爆发以前，日本帝国主义已进攻绥远，策动华北事变，山西形势非常紧张。当时我在山西“牺盟会”总会工作。“牺盟会”全称叫牺牲救国同盟会，创立于1936年9月，是我党在山西建立的统一战线的群众革命组织。名义上，会长是阎锡山，实际上是由中共北方局薄一波同志负责领导。牺盟会基层组织遍布于山西全省，大约有近百万的会员。牺盟会的主要任务，是发动群众组织训练队伍，进行抗日救亡活动。所以会员绝大多数是爱国青年和抗

日救亡的积极分子。我在总会宣传部工作，领导人是宋劭文同志（地下党员）。30年代初他是北大的学生，我也是北大的学生，彼此比较熟悉，尤其在一个部门工作时，关系更加密切。当时裴丽生、傅雨田、侯振亚等同志和我都在一起工作。开始我们的任务是：组织指导民间文艺团体，进行抗日救亡宣传，并负责编写出版《牺牲救国》周刊和各种宣传抗日的资料。后来，牺盟会组织抗日武装——即抗日决死队时，我们宣传工作的重点也转向了学校和广大农村，号召全民总动员，抗日救国，协助组织部门开展抗日武装的军政训练工作。

1937年8、9月间，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山西北部重镇阳高、大同，随后又兵分三路向太原进攻。这时，晋东北形势已一片混乱，国民党军队（包括阎锡山的晋军）全面溃退，各县县长也都弃城逃跑，散兵流匪乘机抢劫财物，奸污妇女，无恶不作，扰害至极。在国民党军队向南逃跑之时，我八路军主力三个师在朱总司令指挥下，东渡黄河，挺进山西，开赴抗日前线。当时八路军总部，就设在五台县南茹村，115师和129师分别驻扎在东冶、河东、豆村、蒋坊等地，开创了山西抗战的新局面。当时，阎锡山为了保持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，特起用牺盟会组织的新军（即抗日决死队）开赴晋东北抗战；同时委任宋劭文为五台县县长、胡仁奎为孟县县长、李仲甫为定襄县县长等，要求立即走马上任。宋知道八路军总部和薄一波率领的新军都已赶进晋东北地区，去五台上任是同我党直接联系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最好机会。他接受了委任，很快离开太原赴五台。在临行之前，找我谈话说：“我去五台要带走几个干部，你文笔很好，又有群众工作经验，对山西的情况也比较熟悉，我已同总会（指牺盟会）商量好，调你同我一起去五台工作，不知你有什么意见？”我说：“没有意见，只要抗战需要，到哪儿工作都行。”那时，我还年青，无牵无挂，听说去抗战前线工作，热情非常高。就这样，9月20日宋劭文和我一起赴五台县上任了。同去五台的还有高晋才、蒋自力、李杰

云等几个干部。后来，宋劭文和我到晋察冀边区政府工作时，五台县长就由蒋自力同志接任，高晋才同志任五台县的会计。

五台县是阎锡山的老家，当地的大地主都是阎的家族和亲戚，封建势力很大。五台县境内的五台山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圣地，周围有300多座庙宇，每座庙宇都拥有大片耕地，出租给当地农民耕种。当地庙宇分青庙和黄庙两种，青庙是和尚庙，黄庙是喇嘛庙。大和尚、大喇嘛，就是当地的封建大地主。他们除了收租、放高利贷剥削农民外，对佃户之妻还享有“住夜权”。这是非常野蛮的制度。当地老百姓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“压在我们身上有两座大山，一是阎锡山，二是五台山。”如何处理好这两大封建势力？是我们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所面临的重要问题。另外，五台县还是牺盟会晋东北中心区的所在地，这里抗日救亡的宣传、组织工作都做得比较好，广大群众抗日情绪非常高涨。记得我们到五台县的第一天，县城各界群众敲锣打鼓，吹奏锁呐，打着“欢迎抗日县长上任”的横幅标语，到县城南门河迎接我们。因为那时候，日本侵略军每攻占一地，实行法西斯的野蛮政策，烧杀掠夺，强奸妇女，无恶不作，群众非常害怕；加上晋东北各县官吏纷纷逃离，群众更是惶恐不安。在这种形势下，我们鼓足勇气上任，对鼓舞士气、安定民心、维持社会治安，有着重要意义。第二天，宋劭文同志就在县府主持召开工作会议，规定原县政府人员一律参加。他讲话的精神是：（一）原政府人员，除县长和部分科长有变动外，其他人员一律留用，照旧工作。（二）当前中心工作，发动群众，组织抗日救亡团体，掀起抗日高潮。（三）现在是大敌当前，从县长、科长到办事人员，一律坚守岗位，同全县民众一起抗战到底，“誓与五台人民共存亡！”当时，我们从太原来的几位同志，也都在会上表示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。我们的行动受到全县民众的拥护和支持。

因为五台山的和尚、喇嘛势力很大，历来受到官府的支持和保护。所以过去每个县长上任，都必须首先拜访大喇嘛，否则“乌纱



帽”就保不住。宋劭文上任，没有去拜访，这是个破例。但是为了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，团结僧侣共同抗日，后来还是派我作为代表，去五台山慰问全体僧侣，宣传抗日救亡思想。

我到五台以后，开始担任县政府秘书工作，实际上是宋劭文的助手，什么事情都管。上面的、下面的，各部门要办的事情，都首先归到我这个口。能办的事，我就决定了；重要问题，我都向宋劭文同志汇报，请他决定。开始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县财政空虚，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而从前线溃退下来的一批又一批国民党军队，路过五台县就到县政府要钱、要粮、要牲口、要车辆。不答应他们的要求，他们就大闹县政府，公开抢劫机关和百姓的财物。政府机关已不能正常办公，老百姓更是怨声载道。有一次，县里来了一批溃军，要县政府立即征调驮骡六七千头，限期完成。宋劭文说：本县驮骡都已被撤退的军队全拉走了，我有天大的本领，也无法办到。事后，宋劭文要我立即给省政府打报告，第一，如实反映溃军纪律败坏、沿途抢劫骚扰情况，要求上级下令约束部队。第二，要求省政府拨给经费，以解决部队的给养和地方的开支。第三，要求省政府出面，督促各部队，把抢去的车骡放还回来。这份报告送上后，还是起到了一点作用，阎锡山派人给我们送来几万两大烟土，让我们变卖当经费使用。当时八路军供给非常困难，没有粮食、没有衣服，五台山地区是高寒地带，气候很冷，但广大指战员仍穿着单衣，光着脚，或穿双草鞋，苦不堪言。我们就把烟土变卖了七八万元，全部供给八路军以解决部队给养问题。当时薄一波同志在五台山，听说溃军骚扰五台县城，为了保护县政府，维持地方治安，他派出抗日决死队第一个纵队的兵力，从台怀镇（即五台山，薄一波领导的决死队第一纵队驻扎在这里）开到五台县城。从此，县政府门口设立了岗哨，才挡住了那些溃军的骚扰。

太原沦陷前夕，阎锡山把山西全省划了7个行政区，设立7个政治主任公署。晋东北地区为第一行政区，包括五台、盂县、定襄、

寿阳、繁峙、忻县、崞县、代县、阳曲、灵丘、浑源、山阴等 18 个县，委任宋劭文为行政区政治主任兼五台县长，公署设在五台县。我的工作，同样也变成了政治主任公署的秘书兼五台县的秘书。记得命令下达后，宋劭文立即派我去太原办理接受委任状、关防、电台等事宜。我到省政府时，看到的是一片狼藉，各机关正忙着搬家，向临汾撤退。阎锡山已先头到达临汾，接待我的是省主席赵戴文。他告诉我说：“太原是守不住了，今后省内已不能同你们直接联系了。请转告宋主任，以后晋东北地区一切事务由他全权处理，不必更番请示，这是阎长官（指阎锡山）的意见。”说完后，就把委任状和晋东北 18 个县的大印交给我；同时还拨给一辆军用汽车、一部电台、15 支枪支和 9 箱子弹。当时忻县已被日军占领，我带了这些东西，坐汽车穿过定襄，顺利地返回五台。这 18 个县的大印是怎么搞到手的呢？当年，阎锡山有个规矩，就是县长离任（不管什么原因），都必须亲自把印章送交省政府，否则以逃离职守论处。所以各县县长逃离时，都把大印封好，送到省政府，这样便可换取“正常离任”的说法。这 18 个大印还是很起作用的，后来宋劭文以此任命了牺盟会干部于寿康、杜向光、赵鹏飞、苏应明等十多位同志为各县县长，使晋东北 18 个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，为晋察冀边区的成立奠定了基础。

## 二

平型关战役以后，大约在 1937 年 10 月下旬，八路军总部及所辖的主力部队，奉命撤离五台，转战晋东南战场。在这以前，薄一波领导的新军，已全部开赴太行山，为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作准备。主力部队撤离以前，中央决定留下 115 师政委兼副师长聂荣臻同志以及一个师独立团（杨成武指挥）、一个骑兵营（刘云彪率领）、师教导队的两个队、特务团的两个连和部分政工干部，约 2000 余

人，留守五台，建立抗日根据地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。

“晋察冀”作为一个行政区，开始没有这个名字，是后来逐渐明确叫起来的。聂荣臻同志接受任务后，就率领这 2000 余人，以五台山为基地，分兵向察南和冀西发展，先后收复冀西、察南 20 余县，建立了敌后抗日民主政权，加上晋东北 10 余县，使晋察冀三省边陲地区连成了一片。1937 年 11 月 7 日，在太原失守前一天，聂荣臻同志在五台正式宣布成立了晋察冀军区，从此，“晋察冀边区”的名字见诸于国内各大报纸，开始叫响了。

关于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，最早是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提出的。大约在 10 月下旬，他给聂荣臻一份电报，主要内容是：要求立即着手筹备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，主席可由宋劭文担任，以加强与统一全区的军政领导等。同时电报还指示，边区政府一面筹备成立，一面向蒋介石、阎锡山提出，力求取得他们的同意后，向全国公开，以便推广到其他边区。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，聂荣臻同志首先找宋劭文同志商量建立边区政权事宜。然后在五台石嘴村普济寺（军区司令部所在地），聂荣臻同志曾主持召开过一次小型会议，记得宋劭文和我，还有孟县胡仁奎县长、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、《抗敌报》社邓拓等都参加了会议，中心议题就是筹备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有关事宜。这次会议决定了以下几项工作：（一）由宋劭文牵头，成立筹备委员会，成员要有晋察冀三省的代表性人物，由委员会着手起草宣言、政府组织大纲、施政纲领等文件。（二）要联络各县、各抗日团体选派代表，召开一次军政民代表大会，选举产生边区政府。（三）冀西、冀中抗日局面已经打开，阜平完全在我们手中，又是三省边界的中心，晋察冀省委已在阜平成立，军区也即将迁往阜平，边区政府可择日在阜平成立。（四）由宋劭文起草报告，送交阎锡山并转国民政府，争取他们能同意，取得“合法”政府的地位，以利于民众发展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这次会后，军区机关迁驻阜平境内。宋劭文和我回到县城，第一件

事就是给阎锡山打电报,说明华北沦陷后,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蓬勃发展,各地都先后建立了抗日政权,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边区政权,要求阎和国民党政府能予以批准。当时,我们有一部电台,同阎锡山一直保持着联系。我们一连发去7份电报,阎锡山都不作答复。后来是胡仁奎出了个主意,把电报内容给修改一下,专门讲新成立边区政府对阎锡山的好处,而且政府成员大部分是阎锡山派来的人,并附上成员的名单:

宋劭文	山西省第一行政区政治主任兼五台县长
胡仁奎	山西省盂县县长
刘奠基	太原绥靖公署参事
娄凝先	山西省第一行政公署秘书
李杰庸	山西省政府秘书
聂荣臻	晋察冀军区司令员、八路军代表
张 苏	蔚县县长、察哈尔省代表
吕正操	东北军五十三军团长、河北省代表
孙志远	保定行营民训处特派员、河北省代表

以上名单是经过聂荣臻同意批准的,把山西方面的代表列上5名,而且大部分是牺盟会的负责人,是为了争取阎锡山的同意。这份电报发出后,果然阎锡山很快复电表示同意,只是在名单上把我的头衔给改了,划掉了公署秘书,改为“牺盟会特派员”。我这个“特派员”的称号,就是这么得来的。阎锡山的目的是把职务提高一下,往国民政府呈报,容易得到批准。其实“特派员”,不是一个正式、固定的职务,当时牺盟会派出的特派员很多,一般县是一名,大县派两名,只是相当于县长或专员的级别而已。谁能想到,30年后的文革中,“特派员”竟成为造反派整我的一大罪状。我记得军政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,阎锡山转来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复电,内容大致是这样的:所请成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及该会组织人选,均照准。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着归阎司令长官指挥,特电遵照。

说明国民党政府正式批准了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。后来，边区政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，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政策，阎锡山后悔地说“我上了宋劭文的当！”在敌后 10 多个抗日根据地中，晋察冀边区政府是唯一得到国民政府批准承认的，取得了合法地位。后来其他地区抗日政府的成立，国民政府再也不批准了。

军政民代表大会能在阜平召开，张苏同志是立了大功的。他原名张希贤，察哈尔人，抗战以前在蔚县当过教育局长，领导过学生运动，是蔚县建党的领导人之一。抗战爆发后，他在太原，见到过周恩来同志。那时国共合作已正式形成，经周推荐，被第二战区委任为蔚县县长。由于雁北、忻口失守，张苏无法赴任。后被我党派到阜平县担任了抗日政府的县长。军政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后，他就是这个县的县长。他有领导才能，工作有魄力，行政管理能力也很强，所以他主动要求承担大会和边区政府的筹备工作。当时阜平是冀西山区的一个小县，物质条件较差。张苏想方设法把县城机关、团体、学校都动员起来，接待各地来的代表。会场就设在县城的一所小学教室里。记得会场里有两条大标语很醒目：一条是“一切为了抗日战争”，另一条是“民主之光”。各地来的代表共 140 多名，来自晋察冀三省各抗日部队、各群众团体、各县政权选派的代表，还有蒙、回、藏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代表。他们分别住在机关、学校和附近喇嘛庙里。当时正是冬天，气候寒冷，没有取暖设备，但是代表们抗日情绪很高，军区派出了很多干部和战士接待他们，为大会服务。由于张苏同志细心安排，克服各种困难，使大会顺利地完成任务。

### 三

新成立的晋察冀边区政府，相当于省一级的政府机构，开始酝

酿设厅,后改为设秘书、民政、财政、教育、实业、司法等六处,以后又陆续成立了银行、贸易局、公安局、农林局、工矿局、粮食局等。分工情况是这样的:宋劭文任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财政处长、胡仁奎任边区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兼民政处长、姜凝先任政府委员兼秘书长、张苏任政府委员兼实业处长、刘奠基任政府委员兼教育处长、王斐然任政府候补委员兼司法处长等。以上几人主持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。另外,政府委员还有聂荣臻、吕正操、孙志远等,他们主持军队工作,随军区活动不在政府办公。李杰庸也是政府委员,边区政府成立后,被调到冀中行政主任公署任主任。军政民代表大会,除了选出我们9人为政府委员外,还选出王斐然、张仲翰、孟阁臣等3人为政府候补委员。他们三个人的情况是这样的:王斐然,河北人,早年在京东地区领导过农民运动,担任过县长。抗战后,他参加了边区政府筹备委员会的工作,是冀省方面的代表,为联络河北各地党政军和各社会团体,参加军政民代表大会作了大量工作,故被选为政府候补委员。王斐然后来担任了边区最高法院院长,是边区司法工作的奠基人。张仲翰,献县人,抗战以前,担任过博野县警察局长、县长等职。抗战爆发后,他组织河北民军,任司令,进行抗日活动。后来他又组织领导津南人民抗日自卫军的活动,在冀中社会名声很大。经吕正操同志推荐,被选为区政府候补委员。孟阁臣,原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,担任过连长。抗战爆发后,他在易县、满城、徐水一带打着“抗日”的旗号,搜罗散兵游勇和当地土匪,拉起一支七八千人的队伍,自称“七路军”司令,在当地称王称霸。晋察冀军区成立时,为了团结各抗日部队共同抗战,曾派人联络孟阁臣,他表示服从军区统一领导,“拥护八路军”等,所以军区曾委任他为易、满、徐军分区司令,并选他为边区政府候补委员。但是他阳一套,阴一套,旧习不改,专门鱼肉百姓,拒不执行军区和边区政府的命令,在所控制的地区勾结日军,迫害我军政干部,破坏抗战,结果被军区依法处决。

从以上 9 名政府委员和 3 名候补委员的政治面貌来看，除了孟阁臣是混入革命队伍的被清除外；其他 11 人中有共产党员、国民党员、牺盟会成员、东北军军官、抗日县长、抗日部队的领导人等等，说明边区政府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政权。但是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是聂荣臻和张苏两人；而宋劭文、胡仁奎、吕正操、孙志远、王斐然、张仲翰、李杰庸和我都是秘密党员。不仅阎锡山不知道，就连我们内部的人，也不完全知道，因为秘密党员都是单线联系的。如胡仁奎在抗战时期一直是以“国民党员”身份出现的，直到全国解放，他才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。正因为通过这些党员去工作，才保证了我们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。

军政民代表大会开得非常成功。会议充分发扬民主，代表们认真讨论边区政府的施政方针，参政议政的意识很强。我记得在讨论贯彻减租减息政策时，会上发生了一些争论。五台、阜平、繁峙等县的部分农会代表，认为五台山的和尚、喇嘛拥有大量土地，是封建大地主，说他们“除了烧香念佛，别无他事，对抗战毫无帮助”等等，主张对他们的租额要多减些，以改善贫苦佃农的生活。农会代表发言后，五台山的蒙藏同乡会以及和尚、喇嘛代表立即反驳，不同意上述主张。他们说：我们是出家人，但出家不出国，我们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，也积极努力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。为什么对别人少减地租，而对寺庙要多减地租？会上很多同志对他们的发言表示同情和支持。当时黄敬、宋劭文、邓拓等同志也先后发言赞同和尚、喇嘛代表的意见，指出要正确对待和尚、喇嘛，这是涉及到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问题。在执行政策上，应该一视同仁，不分彼此。他们还列举了抗战以来五台山寺院对抗日部队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，耐心地说服了农会代表，统一了思想认识。会后，和尚、喇嘛的抗日救国积极性更高，他们组织了“五台佛教救国同盟会”（成立时有 60 多名代表，包括青庙、黄庙的僧人），并举办了蒙、藏同胞训练班，和尚、喇嘛训练班等，以提高蒙、藏同胞和和尚、喇嘛对抗战形

势的认识,增强爱国主义精神。当时这项工作主要由民政处管,他们派人去主持训练工作。因为我是边区政府秘书长,所以有关民族、宗教方面的抗战活动也向我汇报。我记得当时训练班讲授的主要内容有:日本侵华政策、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、中国抗战的形势与前途、东北沦陷后的情况、汉、满蒙、回、藏之间的民族关系等等。经过训练的学员,后来都分赴蒙、藏各地开展抗日活动。

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后,工作是千头万绪的,但是首要任务是解决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。当时边区脱产的军政人员达万余人,吃饭、穿衣、武器弹药的供给以及其他行政费用的开支等等,都急需新政府来解决。据统计,仅军费一项开支,每月就需要70余万元(法币)。另外,边区兴办的军用和民用工业需要投资;商业要资金,农业要贷款,灾民要救济等等,都需要钱花。新政府本身没有钱。虽然边区政府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,但中央政府从来不给经济上的支持。所以当时边区政府确定的方针是:一切从抗战出发,立足于自力更生,整顿财政,开源节流,发展生产,改善民生,保障抗日部队的供给。我要说明一点,我们边区有很多能人,中共北方分局的彭真同志亲自抓财政经济工作,宋劭文、黄敬、胡仁奎、张苏等都有管理经济工作的经验,善于理财,对解决边区财政问题充满信心。他们曾提出建立边区银行、发行边币、发行救国公债、恢复田赋、征收公粮、征收营业税等建议,得到了军政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一致拥护。边区银行是1938年3月成立的,行址设在五台县石嘴村的普济寺,行长是关学文同志。他原来是东北军吕正操部队的军需处长,也是一位善于理财的能手,经吕正操同志推荐,担任了行长职务。副行长是胡作宾同志,他是山西定襄县人,抗战前任过山西省铁路银行郑州办事处主任,对银行业务比较熟悉。边币发行的准备金很有限,最初定为50万元,实际上只有聂荣臻同志从八路军军饷中节留下的4万元法币,吕正操同志打下安国县城所缴获的3万元法币,再加上实物(粮食和棉花)作为准备金,就开始发行边



币。最初发行的是1元、5角、2角等几种边币，由于群众不了解，加上边币纸张不好(大本纸)，大家不信任，流通后，群众又很快到银行兑换法币。后来杨成武同志消灭了叛军孟阁臣，搞到一大批黄金(元宝)、铜元和现钞，把这些都运到了边区银行，并在银行展览，让群众参观，从此树立了银行威信，边币也稳定了。所发行的边币，一部分用于解决抗日部队的供给；另一部分则用于支持工业、商业、农业等方面的建设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与此同时，边区政府还向广大群众发行了200万元的救国公债，从整顿税收中(废除过去的苛捐杂税，恢复建立了入口税、屠宰税、烟酒税、印花税、棉花出境税等等)，每月可收入30至50万元，征收田赋(即土地税)其收入约占整个边区财政收入的20%左右；另外1939年开始征收救国公粮(即农业税)，为16万石小米等等。边区政府就是依靠这些粮款，保证了抗日部队、政府机关的供给和民众生活的改善，有力地支援了敌后抗日战争。征收救国公粮，我们本着“钱多多出，钱少少出”的原则，实行合理负担，照顾广大农民利益，故受到全边区农民的欢迎和支持。当时地主占有土地多，粮食收成也多，当然要多交田赋和公粮。所以少数地主意见大，叫嚷负担太重。例如阎锡山的亲戚就拒不交纳公粮，并向阎锡山告状。后来阎锡山给我们打来电报，说什么“我的几位亲戚已经没有钱粮可交了，他们应交的数目记在我的帐上吧，由我负责。”这分明是赖帐，谁敢向阎锡山去讨帐。后来，我们也不客气，当时阎锡山的管家叫裴斌丞，住在五台县，他手上保存了阎一万多元现金，我们以政府财政困难，硬把这笔款“借”来了，充实抗日经费。1941年边区政府对税制又作了重大改革，实行统一累进税，把田赋、公粮和其他杂税合并为一项税，然后按每户财产、收入多少，划成若干等级，按等级纳税。这样，民众负担更加公平合理，同时又增加了边区财政收入。1939年初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晋察冀边区初创时期所取得的成绩，誉为“抗日模范根据地”。